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智库报告

2020 走向全面小康社会

2020:TOWARDS
A COMPREHENSIVE WELL-OFF SOCIETY

“十三五”规划研究报告

Understanding the 13th Five-Year Plan

李培林 蔡昉／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2020

走向全面小康社会

2020:TOWARDS
A COMPREHENSIVE WELL-OFF SOCIETY

“十三五”规划研究报告

Understanding the 13th Five-Year Plan

李培林 蔡昉／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20：走向全面小康社会：“十三五”规划研究报告/李培林，
蔡昉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1
ISBN 978 - 7 - 5097 - 8435 - 8

I. ① 2… II. ①李… ②蔡… III. ①国民经济计划—五年
计划—研究报告—中国—2016~2020 IV. ①F123.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68829 号

2020：走向全面小康社会 ——“十三五”规划研究报告

主 编 / 李培林 蔡 昝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恽 薇 陈凤玲

责任编辑 / 陈凤玲 于 飞 陈 欣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经济与管理出版分社 (010) 5936722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34.75 字 数：568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8435 - 8

定 价 / 15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2020：走向全面小康社会》课题组

总 负 责 王伟光

顾 问 赵胜轩

执行负责人 李培林 蔡 眇

参加讨论、研究、撰写人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 援	王业强	王宏伟	王宏森	王国刚
王俊秀	邓曲恒	史东辉	朱承亮	任常青
刘建华	刘树成	刘德良	孙婧芳	苏红键
杨宜音	杨春学	杨 舳	杨新铭	李 平
李 成	李 扬	李 林	李 周	李 河
李洪雷	李晓华	李培林	李 萌	李雪松
汪同三	汪德华	张友国	张车伟	张 平
张自然	张晓明	张晓晶	张海鹏	林 宝
金朝霞	郑世林	郑秉文	娄 峰	祖春明
贺 俊	都 阳	夏杰长	倪红福	高培勇
黄群慧	章建刚	董 昱	董裕平	蔡 眇
蔡跃洲	裴长洪	潘家华	魏后凯	

践行五大发展理念 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代序言）

蔡 昉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从全局性、根本性、方向性和长远性着眼，确立了“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理念，即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五大理念。这五大发展理念，认真总结了国内国外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凝聚了各个方面的发展共识，有助于破解我国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回应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发展的新期待，是助推“十三五”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理念。

制定背景：发展阶段新变化

人类关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经历了长时间探索，形成过不尽相同乃至大相径庭的认识及其理论概括。特定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决定了主流发展理念和主攻方向。在较早的发展阶段上，发展往往局限于经济领域，尤其强调经济总量扩大，造成以经济增长替代更广义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倾向。这种倾向在特定发展阶段上一经形成，则导致发展目标的狭隘性、发展模式的偏倚性和发展结果的局限性。在资本稀缺、劳动力相对过剩和居民收入普遍低下的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发展阶段中，以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为导向的发展，无疑有助于扩大经济总量、增加就业、提高居民收入，是增强国力和改善民生的必要前提。

随着发展进程的不断变化，发展条件和发展环境也必然发生变化，不仅在以往的发展理念及其所指导的实践中，长期存在的问题会逐渐积累、日益凸显，而且一些曾经行之有效的理念和实践，也会随时间的变化而趋于失效。因此，发展理念不应该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而需根据变化了的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通过回应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发展不可以且不应该承担的代价是什么，发展应该以何种方式、路径和手段实现，发展的着力点需要放在哪里，发展绩效应该如何衡量，以及发展的成果如何得到共享等问题而与时俱进。

我国发展阶段变化的突出特点及对它的准确概括，是经济发展进入以增长速度换挡、结构调整加速和增长动力转换为特征的新常态。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之际，虽然同时遭遇了一定的周期性冲击，如全球贸易增速减缓，为政策应对增加了复杂性和难度，但是，周期性因素不是新常态的本质特征。单纯强调外部因素或周期因素，而不能抓住造成经济下行压力的主导性的结构性因素，政策就容易偏向采用刺激性手段，形成政府越俎代庖配置资源，或者用补贴引导企业投资的现象。这样刺激出的增长速度，由于没有伴随着企业竞争力的提高、财政能力的增强从而公共产品供给的扩大，不能达到增加有效供给、改善民生的目的，甚至会贻误调结构和转方式战机。因此，对经济形势的判断要统一到新常态特征上来，促进发展必须把五大理念贯穿始终。

五大理念：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统一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充分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对关于发展的目的、方式、路径、着力点、衡量和共享等方面的问题做出了全面回应，具体体现了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的统一。

创新发展着眼于培养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新动力。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实现长达 34 年平均 9.8% 的高速增长，主要依靠体现在劳动力和土地的低成本

优势与技术后发优势上的供给因素，以及居民收入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和对外开放带来的巨大需求因素。随着2010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同时，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达到峰值，人口抚养比抵达从下降转而上升的拐点，经济发展阶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支撑高速增长的传统动力相应式微。

从国际经验来看，许多国家在类似发展阶段上，传统增长源泉逐渐消失，又未能培养出必要的创新能力，失去了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因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从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看，创新能力不强仍是我国与发达国家差距所在。因此，使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形成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动力，才能保持中高速增长，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并进而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根据创新驱动的特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及对增长的贡献能力，是衡量创新成效的一个比较综合性的指标。

协调发展着眼于发展的健康性。我国发展长期存在着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问题，已经成为阻碍新常态下保持中高速增长和实现分享、包容的障碍。国际经验和我国现实都表明，在从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跨越的阶段，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往往因区域、城乡、经济和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等方面的不协调而产生和加深，一些国家也正是因此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坚持“四个全面”，按照《建议》的部署促进发展的协调性，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

绿色发展着眼于发展的永续性，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有一种传统观念认为，增长与污染的关系类似于一条“倒U字形”曲线，因此先污染后治理是一种备选或者不可避免的方式。我国长期以来主要依靠物质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与这种认识偏差有关，已经造成对资源环境和生态的欠债。绿色发展理念认为，人民对优美环境和良好生态的追求，体现了发展的目的本身，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而资源一旦枯竭，环境和生态一经破坏，则难以修复，必然要为此付出极高的代价。特别是，环境恶化对人的生活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的损害，代价尤其昂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让人民从发展中获得幸福感，必然不能以牺牲资源环境和生态为代价。

开放发展着眼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内外发展联

动。我国以往的经济发展，受益于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我们不仅要不断提高利用国际市场、在全球范围配置产能和应对国际经贸摩擦的能力，而且要努力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提高国际经贸等方面的制度性话语权，通过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和打造广泛的利益共同体，主动利用、扩大和引领经济全球化。

共享发展着眼于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发展目的。我国发展中的不协调问题表现为城乡、区域和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以及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全体人民共同进入为根本标志。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最终要落脚于共享发展理念和举措，具体体现为坚持普惠性、保基本、均等化、可持续方向，从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提供更充分、更均等的公共服务。

目标实现：重视潜在增长能力和改革红利

《建议》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提出的总体量化要求，是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到2020年GDP总量和城乡居民收入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番。根据横向和纵向比较，并且从经济增长换挡减速这一新常态特点出发，中高速可以定义为实现翻番目标所要求的增长速度。通过这种倒排方式和倒逼机制，为“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设定时间表，实施路线图也相应由此确定。我国仍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只要把握住新常态下发展重要机遇期内涵的变化，完全可以实现上述目标，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为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实现打下牢固的基础。

2010年我国GDP总量为40.89万亿元。按照到2020年GDP总量和城乡居民收入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番的总体要求，若2015年GDP总量实现7%的增长，“十三五”期间每年需要6.53%的增长率，而如果2015年的增长率是6.9%，则“十三五”期间需要平均每年增长6.55%，即6.5%是底线。要实现这个不低于6.5%的增长速度，关键在于潜在增长能力加改革红利。

目前多数经济学家估算的“十三五”期间潜在增长率在6%~7%。例如，我们根据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的趋势，估算“十三五”期间潜在

增长率为年均 6.2%。与此同时，我们估算的改革红利，即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调整生育政策，以及其他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改革，显著增加劳动力供给、改善人力资本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长期可以将潜在增长率提高 1~1.5 个百分点。不过，改革红利有的可以立竿见影，有的要在较长时间里才能显现出来。只要实质性地推进相关领域改革，在 6.2% 的潜在增长率基础上，增加不小于 0.3 个百分点的改革红利，就可以达到中高速增长的要求。

至于城乡居民收入在 2010 年基础上翻一番的目标，鉴于近年来 GDP 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的同步性有所增强，只要经济增长率能够保证 GDP 翻番目标的实现，也就同时保证了城乡居民收入翻番。更重要的是，上述定量目标的实现必须建立在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必须体现为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在这方面，《建议》从非常广泛的方面做出部署，既有含金量又切实可行。

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建议》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和举措。例如，为促进创新发展，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和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为促进协调发展，加快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提高，加强统筹协调，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为促进绿色发展，实行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等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为促进开放发展，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为促进共享发展，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等。

全面小康社会，不是单纯用 GDP 总规模来衡量的小康社会，也不是仅仅用平均数来表示的小康社会，而是全体人民都能切身感受到的全面的小康社会。只有在五大发展理念的指导下，通过一系列重大战略、政策和举措的实施，着眼于把五大发展理念实际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有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发展成果，才能实现我们的目标。

目 录

践行五大发展理念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代序言）	蔡昉 / 001
“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和重大思路	张晓晶 李成 董 是 / 001
“十三五”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及2030年展望	李雪松 娄峰 张友国 / 035
“十三五”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机制问题及对策	张平 王宏森 张自然 / 058
“十三五”时期农业、农村、农民发展改革研究	李周 任常青 张海鹏 / 075
“十三五”时期中国工业转型升级研究	黄群慧 李晓华 贺俊 / 095
“十三五”时期我国服务业发展改革研究	夏杰长 倪红福 / 128
“十三五”时期我国财税改革与发展	高培勇 汪德华 / 156
“十三五”时期我国金融体系改革	王国刚 董裕平 / 182
“十三五”时期及未来中长期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研究	李平 王宏伟 蔡跃洲 郑世林 朱承亮 / 214
“十三五”时期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及其对策研究	杨春学 杨新铭 / 238
“十三五”时期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研究	裴长洪 / 263

“十三五”时期资源环境发展战略研究	潘家华 李萌 / 293
“十三五”时期城镇化和区域发展战略研究	魏后凯 王业强 苏红键 / 310
“十三五”时期就业发展战略研究	都阳 / 335
“十三五”时期收入分配问题及对策研究	邓曲恒 张平 孙婧芳 / 366
“十三五”时期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前瞻	郑秉文 / 388
“十三五”时期中国人口发展战略及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策	张车伟 林宝 杨舸 / 421
“十三五”时期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问题研究	李林 李洪雷 / 455
“十三五”时期我国文化发展环境和重大问题研究	张晓明 李河 章建刚等 / 482
“十三五”时期社会心理和舆论引导研究	杨宜音 王俊秀 / 504
“十二五”发展规划实施情况的总体评估	张晓晶 董昀 / 517
后记	李培林 / 543

“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和重大思路

张晓晶 李成 董昀*

摘要：“十三五”及今后十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两个一百年”任务的关键时期。深刻认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特别是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对于科学制定“十三五”规划、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走上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就国际形势而言，①全球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回落，处在长周期的下行阶段；②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新技术革命与国际新规则下的全球分工体系正处在分化重组阶段，机遇与挑战并存；③本轮危机后的国家间竞争加剧，这使得中国需要动用更多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资源，以维持和平发展的环境，崛起成本上升。

就国内形势而言，①发展趋势体现为消费结构升级、基础设施投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开放型经济新发展；②增长潜力巨大：储蓄仍然较为充足，工业化城镇化潜力仍然较大，提高劳动参与率和提升劳动力质量可以获取新的人口红利，中国作为后发国家仍能享受部分技术赶超红利，全面深化改革释放新的改革红利，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获

* 张晓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研究员；李成，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董昀，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

取新的全球化红利；③挑战依然严峻：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减速、人口老龄化、金融风险、生态安全以及包容性增长的不足。

“十三五”时期的重大思路和关键举措可以概括为：坚守防范金融危机这条底线；拓展国际、国内两个空间；以绿色发展和包容性增长为主线，以创新驱动为根本动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逐步向高收入经济体迈进的目标。

关键词：新常态 经济形势 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十三五”及今后十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两个一百年”^①任务的关键时期。深刻认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新特点，特别是准确把握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对于科学制定“十三五”规划、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走上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稿指出，综合判断，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我们要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更加有效地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继续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

一 “十三五”时期国际形势

尽管国际金融海啸已逐渐退潮，世界经济也在步履蹒跚中走出衰退。但总体来看，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仍处于深度调整与变革之中。这主要表现在：各国产业、人口、收入分配等长期性的结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相应矛盾还在不断积累；政府与金融业等部门的资产负债表依旧脆弱，债务风险时隐时现；全球经济复苏步伐不一，发展失衡状态进一步延续；新技术领域国际竞争激烈，新的全球产业链正在形成；旧有的国际治理体系弊端凸显，但

^① 即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和新中国成立一百年。

新规则尚不清晰；各国财政、货币、金融监管等多方面的利益诉求多有分歧，相应的宏观政策步调失衡；地缘政治斗争加剧，部分地区安全形势恶化，乃至恐怖主义抬头；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不仅引发市场动荡，而且对国际利益格局产生较大冲击，并成为地区冲突的又一重要诱因。

上述复杂的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对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的中国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特别是中国经济社会逐渐步入新常态，其所面对的增长动力转换、产业结构升级、新型城镇化、人口老龄化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都同各种外部因素紧密交织。因此，在探寻未来中国的发展路径与政策选择时，国际视角的重要性空前提高。

有鉴于此，我们试从长周期视角下的全球经济新常态、新技术革命与国际新规则下的全球分工体系、国家间竞争加剧与中国崛起成本上升等三大方面，展望未来五年至十年的国际趋势，并以此为基础，讨论中国将面临的外部机遇与挑战。

（一）长周期视角下的全球经济新常态

2008年经济危机之前的二十多年，是全球经济大繁荣的阶段，一般被学界称为“大稳定”（Great Moderation）。“大稳定”是全球范围内科技进步、体制机制变化和全球化的综合产物。从“大稳定”转变为大危机，并进而进入以长期结构调整为主要内容的新常态，其实只是“大稳定”繁荣掩盖下的各种矛盾产生、累积、深化、蔓延和爆发的结果。如果从长周期的视角来看，旧常态的辉煌恰恰是由于处在全球经济长周期的上行阶段，而旧常态的转折则预示着全球经济转向下行周期的开始。

从基础技术创新的角度来，18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经历了五次长周期，其中，第五次世界经济长周期的上升期在1980～2007年。这正是前面所提到的“大稳定”时期。这个时期，以信息技术等高科技产业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为核心的“新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加上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的技术创新，以及全球化的发展，开启了持续近30年的经济繁荣周期，也构成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上升阶段。对此，罗斯托（1983）在30年前很有预见性地指出：有两股极其强大的力量——“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第五个周期的上升”和“第四次产业革命”——在对世界经济发

生作用和施加影响。^① 2007 年，以次贷危机爆发为起点，全球经济开始进入下行通道。从长周期角度看，上一波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信息化的动能消耗殆尽，世界经济进入到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的下行阶段。而这也成为新旧常态的转折点，全球经济开始步入新常态。

全球新常态的最主要特征是所谓长期停滞，这一概念总括了未来五年到十年世界经济发展的大体趋势与特征。

就发达经济体而言，尽管开始复苏，但美国、欧洲、日本等有陷入“长期停滞”的迹象。这一观点由著名经济学家、美国财政部前部长萨默斯在 2013 年底提出（Summers, 2014）。其主要含义在于：由于实现充分就业并使储蓄和投资达到均衡的实际利率（即自然利率）处于较大的负值区间，远低于现行的实际利率，因此，传统的货币政策因“利率零下限”（Zero Bound）而失效（如以降息扩充流动性），进而出现投资不足、消费低迷、就业不充分、实际产出增长低于潜在水平等经济停滞现象。

造成长期停滞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技术。无论是经济增长理论还是实践都表明，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在于技术进步。据戈登测算（Gordon, 2012、2014），美国全要素生产率早已重回 20 世纪 30 年代前的历史低位：1980 年至今 TFP 的年均增速仅为 0.5%，约为 1930~1980 年间增速的 $1/3$ 。另有研究显示，由于欧洲、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自身的创新能力有限，而对美国的知识技术外溢依赖较高，所以也步美国后尘，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经历了程度不同的生产率增长减速。

二是人口与劳动力市场。由于人口生育率的下降、预期寿命提高、战后婴儿潮一代退出劳动力市场等因素，21 世纪以来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普遍经历了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劳动参与率下降的困境。相对美国而言，欧洲、日本的劳动力供给状况更为悲观。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由于老龄化和少子化等因素，欧日两大经济体劳动人口相对比重下降的趋势不仅更为明显，而且持续的时间远较美国更长。与此同时，疲弱的经济环境，则进一步削弱了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参与率。

三是收入分配。日趋恶化的收入分配格局，进一步抑制了发达经济体的

^① 关于产业革命的划分有很多不同的观点。这和作者所处的时代有关系。

增长潜力与社会活力，成为导致长期停滞的重要因素之一。实际上，如长期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著名经济学家皮克提等人的研究显示（Piketty 和 Saez, 2013），早在经济繁荣的大稳定时期，发达经济体普遍经历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持续恶化。尽管在 2008~2009 年的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中，这一局面曾暂时逆转，但其长期恶化的趋势并未改变。

上述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正在变为现实。如在雷曼兄弟破产后的近六年间，在流动性普遍宽松的环境下，美国、欧洲等发达经济体仍旧没有回到此前的增长路径（Reinhart 和 Rogoff, 2014），甚至出现了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这意味着增速下降的长期化。值得指出的是，尽管自 2014 年下半年以来，美国经济出现好转迹象，特别是第三季度 GDP 增长率达到 5%（年率），创下了 11 年以来的新高，而美联储也在此时开始退出第三轮量化宽松。但这些迹象还远远不能说明美国经济就此开始强劲复苏。实际上，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 年美国全年 GDP 仅增长 2.4%。这一数字在近年来并不出奇，更慢于危机前 3% 的趋势增长率（即 1990~2007 年美国增长率的平均值）。同时，较之于美国，欧洲、日本等经济体的表现则更为逊色。特别是两大经济体都在此时陷入了公共部门债务高企、私人经济活动停滞，以及通货紧缩隐现的困境之中。

就新兴经济体而言，新常态的提法也同样适用。尽管各国面临的问题不同，但如仅聚焦于经济放缓，则可以归结为供给侧与需求侧两大类因素。在供给侧，第一，步发达经济体的后尘，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现象日益突出，劳动力供给由此收紧，工资成本优势逐渐丧失；第二，在后发国家同先发国家的技术差距不断缩小的同时，技术外溢对增长的贡献减弱；第三，在经历长时间的粗放式发展后，新兴国家的资源环境约束也趋于紧张。而在需求侧，第一，随着经济发展步入新阶段，新兴国家以高储蓄、高投资为特征的增长驱动模式弊端渐露，普遍出现投资回报率下降、资本配置低效、产能过剩等现象；第二，由于社会保障体系发展滞后、国内市场扭曲严重等原因，新兴市场的国内消费持续低迷，特别是难以在短期内弥补投资需求的下降；第三，在发达经济体增长整体放缓，以及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新兴经济体的外部需求已经严重萎缩且前景不容乐观。

（二）新技术革命与国际新规则下的全球分工体系

本轮经济危机后，全球经济的增长明显放缓，既有的全球分工体系被打

破，全球资源需要重新配置。在新的国际分工形成的过程中，新技术革命与国际新规则将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首先看新技术革命。在全球经济增长遭遇逆风的同时，以互联网、再生能源、数字化制造三者深度整合为主要特征的所谓“第三次工业革命”却悄然而至（里夫金，2012），并成为21世纪以来人类在生产力上的又一次飞跃。可以想见，这轮技术变革将极大地改变人类的通信系统、能源模式，乃至生产生活方式，并在很大程度上重塑国际分工体系和利益分配格局。在这一潮流之下，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在国际分工中扮演不同角色的经济体将面对不同的历史机遇与挑战。

对发达国家而言：由于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等多个维度的既有优势，新技术革命将最有可能在发达经济体发生，并进而强化后者在分工体系中的“中心”位置。如在近年来美国推动的制造业回归中，更加强调制造业中的创意设计与数字化，绝非简单的工厂设备回迁。而与此同时，德国也提出了以物联网、云计算和智慧工厂等为核心的“工业4.0”发展战略。值得一提的还有21世纪以来机器人产业的崛起。2014年，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和安德鲁·麦凯菲（Andrew McAfee）研究了这一快速的转变。他们在《人工对机器》中写道：“最近的机器人对人类技能的替代速度和替代范围有深远的经济影响。”在他们看来，低成本自动化技术的出现预示着规模足以与20世纪农业技术革命相媲美的巨大变革，农业革命导致美国的农业就业人数占总劳动力的比例，从当初的40%降到了如今的2%。麦凯菲认为，此次变革不但可以类比于农业的工业化，同样也可比肩20世纪制造业的电气化。机器人成为发达工业化国家重获制造业优势的重要砝码。当然，发达经济体由于处在创新的最前沿，也意味着可能承担较大风险。如何减少、分散此类风险，调动市场主体的创新动力，是对发达经济体的又一个重大挑战。

对新兴市场国家而言：一方面，面对新技术革命，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往往处于相对接近的起跑线上。这为后发国家的赶超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而后发国家也普遍具有摆脱旧有格局，争取向“中心”靠拢的积极性。此外，在“大稳定”时期，后发国家普遍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高速增长，从而在经济、科技、文教、基础设施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为其迎接新技术挑